

.....

ZHONGDIANXUEKEXILIE · ZHONGDIANXUEKEXILIE

马克思主义与 当代文化发展

许 明 马 驰◎主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ZHONGDIANXUEKEXILIE · ZHONGDIANXUEKEXILIE

马克思主义与 当代文化发展

许 明 马 驰◎主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文化发展/许明,马驰主编.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

ISBN 978-7-80745-244-7

I. 马… II. ①许…②马… III. ①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②文化—发展—研究—中国 IV. A811.67 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64542 号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文化发展

主 编:许 明 马 驰

责任编辑:余 同

封面设计:闵 敏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com> E-mail:sassp@sass.org.cn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上海图宇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 毫米 1/16 开

印 张:21.75

插 页:2

字 数:390 千字

版 次: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745-244-7/A·000

定价:4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 序

王崇喜

上海社会科学院创建于1958年。半个世纪以来,全院科研人员为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为使学术研究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经受了历史的检验,赢得了良好的学术声誉。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我们审时度势,明确定位,提出把上海社会科学院建设成为“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社会主义新智库”的目标,以此为导向,切实推进重点学科和特色学科建设,使上海社会科学院的科研工作和科研水平获得了进一步的提升。

社科院50年的学科建设与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专业研究机构,上海社会科学院成立伊始就以扎实深入的学术研究为各项工作的重心。我院的科研人员广泛开展社会调查,积极投入对社会主义现实问题的理论探讨。1959年4月,经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倡议,在上海召开了以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作用为主题的全国第一次经济理论讨论会。为此,经济所成立了三个调查组,兵分三路同时开展社会调查,写出了11万字的6个调查报告。这些研究成果密切联系社会实际,记载了有关价值规律作用的许多生动资料,引起学术界的重视。1961年,姚耐、雍文远等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材(社会主义部分)》出版,它是我国在“文化大革命”前公开出版的第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发行量达20多万册。

在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方面,我院的科研人员也做了大量工作。1958年9月,由经济研究所科研人员编撰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恒丰纱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同年10月,《大隆机器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光明日报》、《学术月刊》、《新闻日报》及国外学术刊物对此作出了积极的评价。1958年以后,历史研究所的科研成果《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行为罪行》、《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戊戌变法史论

丛》等相继问世。这些珍贵文献的整理和出版,为 60 年代初期全国史学界共同促进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作出了基础性的贡献。

1978 年,上海社会科学院恢复重建。广大科研人员焕发出极大的科研热情,他们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指导,牢牢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紧紧围绕改革开放的主题,全力服务于全国和上海的发展,在基础理论和现实应用两大领域着力突破,哲学、法学、经济学、文学、历史学、社会学等都取得了一批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成果。

学科是孕育学术杰出人才的摇篮。这里仅以经济学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研究两个学科的发展为例加以说明:

在经济学研究领域,1980 年,陈敏之提出住宅是商品的观点,为后来房地产市场的兴起和福利分房制度的改革作了最初的理论准备。1985 年,雍文远主持的国家课题“社会必要产品论”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了体系创新和理论深化。这两项成果都获得了孙冶方经济学奖。此外,部门经济研究对社会经济的推动作用日益显著。1982 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向国务院提交《关于建立和开发长江三角洲经济的建议》。1983 年,部门经济研究所承担的国家课题“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得出重要的研究结论:(1) 上海城市经济必须从以工业为主的单功能向多功能方向转变;(2) 上海工业发展必须由拼设备向依靠高技术进步的方向转变;(3) 在产业结构方面,必须从优先发展工业向优先发展第三产业转变。90 年代初,姚锡棠等参与开发浦东研究的学者提出:浦东应建设成为既有金融贸易中心,又有先进制造业的多功能的综合经济中心;在尽量发挥外滩作用的同时,要下决心把中央商务区特别是金融中心放在浦东的陆家嘴;浦东开发开放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带动长江流域特别是长三角的发展。而 18 年来浦东和长三角的发展,正是印证了姚锡棠等人的战略判断。在这个基础之上,浦东新区也和上海社会科学院结成了战略合作关系,正在共同推进关于浦东改革“先行先试”的战略研究。

1991 年 11 月,我院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正式成立。1993 年 2 月,院党委决定成立上海社会科学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这是全国第一个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中心成立后马上参与筹备中宣部 1993 年 6 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1994 年 1 月,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在中央党校、国家教委、中国社会科学院、解放军国防大学和上海社会科学院组建的 5 个研究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地,要发挥骨干作用”,我院被列为全国研究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1997 年党的十五大将这一理论确立和命名为“邓小平理论”)五大基地之一。

进一步加强学科建设,共同发挥基础理论与 应用研究在社会主义新智库建设中的作用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and 优秀人才走向世界。”这是对我院建设社会主义新智库的根本要求,也是我院学科建设应当为之不懈努力的目标。

为了更好地发挥上海社会科学院的整体优势,努力拓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广阔领域,既重视和加强原有基础理论研究,又鼓励和扶植新的学科增长点,我院于2002年正式确定政治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世界经济、国际关系、经济刑法、上海城市史研究、思想文化、社会转型与社会发展等8个重点学科,集中一定的资源推动这些学科的建设。2006年,我院的重点学科增加到12个,除原有的8个以外,还增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城市文化、中国近现代经济史和传统中国的社会文化研究。同时,批准了14个特色学科,分别是:劳动就业与社会保障,文化创意产业,家庭学,租界、租借地等特殊地区研究,犹太学研究,上海合作组织研究,西方文学文化批评思潮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研究,经济伦理学,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中国学术思潮史,科学哲学研究,信息资源管理,城市化研究。重点学科和特色学科的设置,体现了我院在学科定位、科研理念、科研体制和科研方法上的创新和探索,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正在发生的转型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新要求。

近几年来,我院学科建设和发展取得了十分骄人的成绩。一方面为推动基础理论研究和创新做出了重要贡献,许多重要观点、思想和方法在上海乃至全国都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为上海乃至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的决策咨询和服务,许多好的政策建议都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学科建设和新智库建设正在形成新的良性互动关系。

其实,社会主义新智库建设既离不开扎实的基础理论的创新发展,也离不开应用对策的系统研究。我院学科建设和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新智库的重要基础。没有学科建设和创新,就不会有扎实的基础理论和创新,新智库建设也就不会有活水之源。事实已经证明,大量的有针对性的对策研究和应用研究一定是建立在扎实的基础理论研究基础上的,否则就不会有科学性,不会有说服力。因此,在推进新智库建设中,我们必须要以学科建设为重要抓手,通过促进学科发展,为智库建设提供理论基础、为党和政府提供决策咨询、为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提供人才服

务,为社会文明进步提供智力支持和知识服务。当前,我院学科建设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发展形势,我们应当抓住机遇,积极主动地适应党和政府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提出的新要求,努力从如下几方面着手,加大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力度。

一是以促进学科建设夯实研究基础,推动理论创新。理论基础和科研学术能力是我们的立院之本,也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智库的根本所在。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学科建设,鼓励研究人员以学科发展为载体,扎扎实实做好基础理论的研究,推动基础理论创新。

二是以促进学科建设提升决策咨询研究和智库服务的能力与水平。学科建设是提升决策咨询研究能力和水平的基础。我们鼓励科研人员在开展扎实的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积极申请和承担决策咨询研究课题,以学科发展带动决策咨询研究。

三是以促进学科建设培养和开发智库型人才。科研人才是我们的建院之本,智库型人才则是我们建设智库能力之本。我们通过学科建设带动学术团队成长,一方面注重发挥研究者的个体主动性、创造性,同时更注重推动不同学科的综合研究和团队研究。我们要充分利用社科院多学科的优势,积极开展跨学科综合性研究,促进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交叉融合,促进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互渗透。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丛书,集中反映了我院重点学科、特色学科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其中有功力扎实的理论分析,也有思想敏锐的真知灼见;有基础雄厚的体系构建,也有匠心独具的新颖见解;有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也有对现实问题的追踪。通过这些重点学科和特色学科成果的展示,我们可以感受到上海社会科学院科研人员不断求索的敬业精神,同时也印证了哲学社会科学在我国特别是上海的发展和繁荣。我相信,在未来的发展中,我院的学科建设一定会为新智库的发展做出更好更多的贡献。

2008年6月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院长)

序 言

许 明

与本文题目相关的研究,不是一部专著可以解决的。甚至可以这样说,这应是整整一个时代研究的课题。所以,一部书的作用,仅仅是在一个特定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文化发展”的某个层面和某些相关的问题作一个解读。

解读这个问题的基本前提是:20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发展有着无法分开的紧密关系。这种关系已成为融入中国社会发展中的有机部分。想要把马克思主义从中国文化发展的进程中一笔勾销,这是不现实的,也是有悖历史事实的。

从客观上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发展的关系究竟怎样呢?

马克思主义在来源上是西方文明的产物,用恩格斯的话讲,它来源于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同时,它又是现代性的产物,是工业文明的精神成果。马克思主义所包含的普遍性真理,与人类的资本主义时代与工业文明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它既是欧洲思潮,又是人类普遍性价值的某种体现。

而传统的中国文化建筑在独立自主的东方社会发展轨道上,与西方文明隔山相望,隔洋相生。他们之间如果有联系,也是有限的,局部的,非本源的。大概只有来源于南部的印度佛教才对中国文明产生过实质性的影响。就是这样两条不同的文明线路,在人类栖居的地球上发展了数千年,完成了大致相同的价值理念,思维方式,行为规范,甚至科学成就。对历史学家来说,东方与西方,这永远是两位隔山相望的兄弟,他们是如此强健地发育生存了数千年,养育出了高度发达的各自的文明系统。但是,在一百多年前的某一刻,他们相遇了,相碰了,甚至相撞了——1840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历史时刻,鸦片战争的炮声打破了中华帝国自守一局的幻梦,掀开了两种文明大规模相遇的历史帷幕。——所有的中国近现代史产生的问题,都与这一幕有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碰撞也与此有关。

要说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发展的关系,首先要说到中国文化发展的状况,

要说明,中国文化发展不是一般地仅仅需要马克思主义,而是需要一种外来的文化能激活它的已经懒惰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恰恰迎合了这样的需要。

中国文化,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已经发展了 8 000 年。有文字记载的文化遗存有了将近 5 000 年的历史。中华文明在雅斯尔斯所谓的前轴心时代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核心平台:诸子百家、孔孟庄墨……这是在大约公元前 5 世纪时期的文化凝聚状态。这也是华夏民族在青春期形成的精神世界。但是,这个精神世界是初始的,不稳定的。尽管汉皇朝对诸子百家学说有了进一步的提升和综合,但毕竟这是中国封建王朝形成之初的意识形态,它有着极大的可变性和包容性,它的开放度和张力与中国公元之初的不稳定社会状况正好相匹配。它注定不稳定的边界是一定要被打破和改变的。

这种打破和改变,就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一次文化转型的开始。它的契机是印度佛学传入,它的社会基础是两汉不稳定的社会基础结构——它是不稳定的,因为这是封建制度尚未定型的社会状态,历史将继续给它生命发展的时间和空间。公元 2 世纪左右的原始封建制的开始衰落,一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一个巨大的历史性的低谷。从社会发育层面上看,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制度发育健全的样本,唐以后,它的强盛的躯体开始走下坡路,宋元明清再也没有达到它那种充满活力的巅峰状态。一个社会的健全的发育一定有为它辩护、为它设计的理论,唐代的社会发育来不及形成它的哲学论证,这个论证要到宋明理学时代才完成。朱熹是中国成熟的封建社会最为杰出的代表,他的“四书集注”之类的集大成之作,不仅仅成为一个时代,而是成为中国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标志性精神成果。对于论证这个完备的、发育完全的封建专制社会而言,朱熹的“理学”是真正完备的。它成为中世纪中国的精神高峰,这是毋庸置疑的。

明清两代,是宋明理学理想的“兑现时代”,是完成式的实践的近代理想时代。“所谓祖宗之法不可违”,出之慈禧太后之口,所指的“祖宗之法”,也就是被宋明理学所固定下来的封建专制主义的精神传统。这个精神传统的“自保持”能力极其强大,在社会条件未能充分发育完善的情况下,在它的精神替代物没有真正出现的条件下,它是不会自然消亡和退出历史舞台的。

社会变动比之观念的变动要迅速得多,明中下叶以降,西方工业文明所启动的现代化运动的先潮已波及中国,如果不是文化相对保守和落后的满清入关,中国的近代社会变革也许会加快许多。但是,尽管拉长了时段,变革仍是缓慢而有力的。西方的科技和社会文明的点点滴滴,通过封建皇朝捂得严严实实的铁幕,终于还是渗透了进来。到了清中晚期(19 世纪 50 年代以后),上海甚至出现了“租界”,给传

统中国带来了全新的世界发展的信息。

这一切的变革给中国文化带来什么样的震荡和冲击呢?

中国传统社会的独特结构和它的严密的系统构架,使“嵌入式”的现代化运动来得特别缓慢,一直到欧洲的资本主义发展已经到它的高级阶段时,中国的封建权贵们仍然沉浸在他们的“天朝大国”之梦中。按照自然发生的规律,观念变革的建设比之社会变革要慢得多,也困难得多。但基础变化一旦发生,它与传统观念的冲突就立即产生,清末有诗云:“万马齐瘖究可哀!”一批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最先感觉到了这场冲突的到来,并预感到了20世纪中国命定地将会发生的大震动、大改革、大变局。

现代化的进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进入了古老的中华大地。但为这一进程辩护,迎接这一进程到来的精神却没有准备好。传统是抵抗和反对这一进程的,因为传统已习惯了“祖宗之法”的安稳和平静。它告诉人们遵守农耕社会的专制制度要遵循的一切准则。只有外来的思潮才有可能打开这“铁屋子”并吸引进希望之光。

到20世纪之初的时候,“线装书”所包裹的传统思潮已经无法支配中国这头跃跃欲试的醒狮了。人们渴望着外来思潮的冲击,像吸氧一样吸取着一切新鲜血液的营养,马克思主义就是适时而至的“外来思潮”之一。

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初的中国成为风靡一时的社会思潮并成为激进的知识分子的精神支柱,不是毫无道理的。在资本主义发展方兴未艾的历史时期,只有马克思主义为被压迫人民的根本利益设计了获得自身解放的道路。19世纪20年代成立的中国共产党,首先接受的就是工农革命、武装斗争和打倒列强——这是中国的特别国情形成和产生的现实土壤。马克思主义在这个现实土壤中能够扎根,完全得益于与中国国情的相契合。这种契合,是多层面的,多角度的。它是建立在经济—政治分析基础之上的社会科学分析方法与道德关怀相结合的世界观。恰恰是在这一点上,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的就是这个层次。换句话说,中国传统文化在面临西方现代性的挑战时,内中缺乏激发这个社会前进所必需的新的观念和它们构成的体系——这种缺乏给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带来了历史契机。

整个20世纪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实践的历史时段。一切成就和灾难都已揭晓,一切可能都在形成。到现在为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过程中的合理性正在被历史所证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被扭曲化,造成“文革”这样的灾难的历史过程也正在被深度揭示和反思。它在21世纪的命运如何将会被重新思考。本书能为这样的思考提供一点参考,就是作者们的最高心愿了。

近年来,上海社会科学院思想文化研究中心先后承担了一批国家、中央部委和上海市的研究课题,如:许明承担的中共中央宣传部课题:“当前思想文化的状况和意识形态建设”,“当前我国思想领域的总态势、积极因素、问题及对策建议”,“当代意识形态建设的逻辑前提、思想内核和历史境遇”;马驰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当代文论的影响研究”;许明承担的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系列课题”子课题:“加强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问题”等,在学术界和思想理论界引起反响。中心成员出版的著作,如许明主编的《先进文化论》,花建主编、重点学科成员参与的专著《文化力,先进文化的内涵与21世纪中国和平发展的文化动力》,马驰的《艰难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曾军的《接受的复调:中国巴赫金接受史》等在学术界和思想理论界获得好评,其中许明的论文《被困惑的理性与人文研究的方法探索》(上)(下)获第八届上海社会哲学科学优秀成果论文三等奖(2006年)。许明的内部探讨《对“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发表后宣传工作的六点建议》获上海市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内部探讨优秀成果奖,马驰的论文《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及对我国文论建设的启迪》获第八届上海社会哲学科学优秀成果论文三等奖(2006年),曾军的著作《接受的复调——中国巴赫金接受史研究》(著作)获第八届上海社会哲学科学优秀成果著作三等奖(2006年)。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个集子,集中反映了中心成员近几年的研究兴趣、成果和研究方向。其中既有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著、国外马克思主义乃至西方重要思潮的研究、解读,也有对中国当下文化发展问题的多角度、多视野的思考,体现了重点学科研究方向。该书主编:许明、马驰;执笔者:第一章,许明;第二章,马驰;第三章,曾军;第四章,吴文娟;第五章,徐清泉;第六章,王国荣。我们谨用这本文集与全院同行一道庆贺上海社会科学院成立五十周年。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序 言 / 许 明 / 1

— 第一章 理念与创新：对中国当代文化发展若干问题的思考 / 1 —

- 第一节 文化发展的理念和中国文化发展之我见 / 1
- 第二节 中国问题：文艺学研究的当代性 / 29
- 第三节 被困惑的理性与人文研究的方法探索(上) / 33
- 第四节 被困惑的理性与人文研究的方法探索(下) / 55
- 第五节 蔡仪的精神遗产对当代学术研究的影响 / 61
- 第六节 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 / 72

—— 第二章 视野与路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转向 / 78 ——

- 第一节 向更广阔的文化领域的转向 / 78
- 第二节 关注大众文化 / 116
- 第三节 寻找新的理论增长点 / 125

—— 第三章 桥梁与转换：跨越东西方的研究范式 / 146 ——

- 第一节 巴赫金狂欢化理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 / 146
- 第二节 鲍德里亚走出了马克思? / 158

第三节 都市文化研究：范式及其问题 / 169

第四节 市民化进程与城市文化传承 / 176

第五节 观看研究的路径与困境 / 185

——第四章 吸收与借鉴：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之路 / 193——

第一节 世界先进文化的内涵与我们的吸收 / 193

第二节 全球发展时代与世界民族文化走向 / 204

第三节 娱乐经济：新世纪的经济增长点 / 214

第四节 上海市总工会文化系统的管理模式和运作机制 / 229

第五节 营造吸引人才的人文环境 / 239

——第五章 身份与使命：城市文化与知识分子问题研究 / 245——

第一节 都市文化形神内涵的演绎及实践 / 245

第二节 创意产业：在把握本质中寻求提升 / 258

第三节 由市场交易特点看创意产业 / 273

第四节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角色责任及相关问题 / 280

——第六章 反思与前瞻：审视中国文化的过去与未来 / 297——

第一节 信息化与文化产业：互动、问题与对策 / 297

第二节 网络文化语境下的数字安全与和谐社会 / 309

第三节 “吴文化”与现代化 / 320

第四节 世博会：科技、文化创造发明的世界级平台 / 327

第一章 理念与创新：对中国当代文化发展若干问题的思考

第一节 文化发展的理念和中国文化发展之我见

—

关于“文化”的论著，已经是汗牛充栋，读不胜读了。事实上，只有具体的“文化”，而没有抽象的、一般的“文化”。谈论“一般文化”的著述，往往是吃力不讨好的。果不其然，关于“文化概论”、“文化论”之类的原理性著作，往往陷入大同小异概念空洞的陷阱而不能自拔。然而，我们这次做的事情，恰恰就是讲“原理”的，是研究“文化发展”的。

当然，我们是有理由的。新时期 20 多年来，关于“文化发展”的研究，迄今没有一部完整的专著，甚至连论文也所见极少。我们要讲的“文化发展”，不是讲一般的文化史。讲文化史的专著，已经是数不胜数了。我们研究的着重点在“发展”。不仅是“发展”，而且还要“论”。也就是说，我们是想专门研究关于文化的发展规律的。

这个题目的可靠性如何呢？首先，过去的文化研究，描述“发展”的多，而研究发展的少；描写具体文化门类发展的多，而研究大文化演化发展规律的少。这好像一个进入深山老林的旅游者，一头扎进小路小径而无法通过地图或站在高处观看全貌。就文化而言，通过这个门类与那个门类的比较，这个时代与那个时代的比较，都可以从中发现总体文化发展的内在理路，令你由于有了全局而对局部更加了解。

研究文化的发展，就不得不回到抽象、再抽象。只有高高在上，才能触摸本质；

只有跳出具体而又繁杂的文化现象,才能达到整体从而把握“具体”。

我们将文化发展之流比作发源于青藏高原而奔泻于千山万壑间的黄河长江,其九曲十弯可以比作文化发展的艰难曲折,但其奔泻而下直入大海的趋势,是势不可挡的。它的特征就是向前,向前,所以,才有“发展”这一研究对象的存在。

关于“发展”,人类思想史资料表明,从古希腊罗马时代开始(也包括中国的先秦时期),就有了丰富的论述。苏格拉底(Socrates 前 469—前 399)认为,世界万物发展的原因,是整个宇宙中的合目的性原理。而柏拉图认为,宇宙的生长过程,就是神运用理念规定物质和物质模仿理念的过程,也是自然界从混沌杂乱到清晰并转而为人们所认识的过程。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在事物的发展中,“形式”是积极的、能动的,是动力之源。^①

恩格斯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论述:“中世纪是从粗野的原始状态发展而来的,他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律一扫而光,以便一切从头做起。”^②

一个时代,把古代文明“一扫而光”以便从头做起,把“文明发展与文化发展”的“发展”表达得淋漓尽致。

当然,历史已经表明: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如此看待文明和文化发展的。德国文化哲学家斯宾格勒(Qswald Spengler 1880—1936)就认为,历史学不是研究连续的进步,而是比较不同类型的文化模式。他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认为,世界历史上有八种自成体系的伟大文化,即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墨西哥的玛雅文化、西亚和北非的伊斯兰文化和西欧文化。每种文化都有其内在的发展逻辑,并自成体系地形成发展脉络。但是,斯宾格勒并不重视各种文化的发展脉络,而是过分强调了八种不同的文化模式的比较特点。而在文化发展的研究上,他持有的终结论和宿命论的历史观,反映了德国黩武主义在军事冒险失败后的绝望心理和没落情绪。

当然,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Toynbee, 1889—1975)对文化史也持“发展”的态度,但他对“发展”的内在的机理却持有明显的“英雄创世论”,他称“富有创造力的少数人”是文明发展的动力,这部分人满怀“生命的激情”,带领“怠惰的多数人”以“挑战与应对”的法则行事,这种“挑战与应对”的状况决定着文明的特征与生命力。^③这种根本上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相对立的历史—文化发展观,在露

① 参见《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133 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400 页。

③ 汤因比:《历史的研究》。

丝·本尼迪克特(Rrth Benedict, 1887—1948)、马克斯·韦伯(Marx Weher, 1864—1920)等人那里也表达得十分明显。特别是后者,坚决不同意人类文明都是从“原始阶段”一步步发展到今天的“高级阶段”这种历史进化论。他断定,整个历史实际上没有高低之分,只能依据其自身的标准和价值,而不是观察者的价值来进行评判。

中国历代思想家用中国哲学的语言表达了他们对文化与历史发展的看法。古代中国,思想家们用“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老子·第六十四章)这样简洁明了的语言来表达世界万物变化发展的观点。其中,王夫之对历史进化的思想表达得极为完整,他在《读通鉴论》卷二十中说:“三代沿上古指缝间,国小而君多……而暴君横取,无异于今川、广之土司,衣百结而食草木。”根据这样的事实,他对历史发展形成了变化、发展、进化的朴素实在的看法。王夫之说,“变化日新”,“荣枯代谢而弥见其新”,^①其锐利而明确的历史判断,令人叹服。

对近代中国产生最广泛影响的历史思想是严复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它宣传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后来,流传至广被近代中国思想界广为接受的“物竞天择”,就源于此,它成为近代中国革命运动和社会改造浪潮的精神动力。

“文化发展”成为一个研究对象,如上所述,是有思想史的根据的。即使是斯宾格勒,他的末世主义哲学也没有能够掩盖“文化发展”这一事实。当然,我们在这里讲的发展不是呈线型的一味从低到高的行程,它的高不可及的顶峰状态,恰恰不是历史性地存在的,如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文化,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欧洲15世纪至18世纪的文艺复兴,以及中国的宋明理学达到的学术水准,都是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出现的文化高峰,是值得研究的历史关节点。

将“发展”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这是个全新的学术研究课题。从宏观上观察“文化发展”之流,最重要的是把握和分析这个发展之流的整体特征。这对于没有借鉴地研究来讲,困难是显而易见的。上面我们分析过,斯宾格勒、汤因比、本尼迪克特等西方文化史大家,也只是分析了文化发展的静态特征。如斯宾格勒,他描述性地把文化类型分成“春、夏、秋、冬”四个阶段,又用“前文化时期、文化时期、文明时期”来阐述它的阶段性质。无论怎样雄辩,他的表述是表面的,而不是深入肌理的。而汤因比使用了与斯宾格勒相同的办法——现象归纳法,将世界上的文化划分成12种文化类型,并企图勾画出“局部文明循环论”的理论框架。本尼迪克特用

①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大易》。

“有机整体”这样的术语来描述文化结构的整体特征,比之前两位,已有了更多的思想性和方法论性质。他在《菊花与军刀——日本文化模式研究》一书中,就运用了这种方法而将文化有机地融合进去。

这些西方文化学者企图对文化史作整体特征描述时,恰恰缺少了从各主要因素的辩证关系着手分析的角度。在人文研究中,20世纪20年代以来西方主流学术摒弃马克思主义传统已成为一种潮流,所以,马克思主义所操持的辩证法,这些西方学者是不熟悉也是不会主动加以运用的。我们在这里使用的方法,恰恰正是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中最常见和常用的方法:在对立统一之中寻求各关联要素的联系。

通常我们谈文化特征往往侧重于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民族性包含在时代性内容之中,时代性亦包含在民族性内容之中。然而,民族性与时代性分别是从空间与时间两个不同的维度对文化发展特征的概括,无法全面反映出文化发展的特征。要认识文化发展的特征,必须从不同的视野全面把握文化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特点,从空间、时间两个维度并结合文化自身的结构、文化领域与其他社会领域的关系,此文化与他文化的关系来综合考虑。如此看来,文化在发展过程中至少呈现四大特点:从空间维度,从文化自身的结构以及此文化与他文化的关系、文化领域与其他领域的关系来看,表现出整体性与差异性以及先进性和落后性的特点;从时间维度来看,文化发展历史的过程体现为稳定性与时代性的特点,而其发展的形态则呈现出常态性和危机性的特点。

从时空的维度展开文化发展的整体性与差异性、先进性与落后性、稳定性与时代性、常态性和危机性的矛盾关系分析,是文化发展分析的“牛鼻子”,是研究所使用的如同康德的十二基本范畴。这些范畴本身的存在是一种客观事实,并且涵盖了所有文化现象和文化发展过程。

文化发展特性的“四矛盾论”,仍是文化发展的外在表象,当然,这种表象是有机相联的,是具有普适性的。从中国文化发展的轨迹与特点来看,可以证实这些基本矛盾的存在和对文化发展的影响。

本书除了阐明文化发展的基本矛盾关系外,还以中国文化发展的具体特征为实例,描绘了中国文化发展的路径,剖析了这个过程所包含的矛盾性和矛盾运动过程。“四矛盾说”在这里淋漓尽致地得到了展示。

二

华夏文明八千余年,从凿石为斧的初级加工工具阶段,到精镂细刻的宫廷艺